

职业资格认证与人才评价机制

■本报记者 韩天琪



张一名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再次公布取消61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2014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分四批取消了211项职业资格,本次再取消61项,至此,国务院公布取消的职业资格达到272项,占国务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总数的44%,完成本届政府确定的减少1/3的任务。这标志着职业资格集中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人社部近年来取消如此多项职业资格认证有哪些原因?在完成职业资格清理工作之后,应怎样建立起科学规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劳动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一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程杰。

外在环境与内在要求

张一名认为,取消多项职业资格认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进一步适应国家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强化服务的政府改革要求,也是人社部响应政府改革要求的举措;二是进一步为市场主体松绑,进一步释放企业的自主权和活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是职业资格评价制度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我们过去偏向于资格认证,现在要转变职业资格管理的理念和方式,逐渐转向加强职业资格的评估和监督,更好地营造人才发展的环境。”张一名说道。

程杰强调,这种从内外两个方面解释取消多项职业认证资格的理解是对的。“如果仅仅把职业资格清理与目前的‘双创’背景相联系,的确是片面的。”程杰认为,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此次清理工作是为了让市场起到资源配置功能、深化资源配置改革的一项内容。

1994年,我国开始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它的设置初衷主要有以下考量:一是通过职业资格认证,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技能;二是建立科学评价人才机制,维护就业市场秩序,体现公平用人;三是依法对涉及公共安全、人身安全、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业,设定准入门槛,严格加以规范,确保职业安全。总体上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设立,对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实施人才

e见

人生总会面临挫折、逆境,但要想得开,岂能钻牛角尖而不能自拔。有时候,放弃是一种选择,但无论如何不能选择放弃你的生命啊!有什么东西还能比生命更珍贵?

行文至此,忽闻南京邮电大学一研究生(1月25日),因无法忍受导师之对待,发生了不幸事件。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何不往远想一想,你的身边还有父母、兄弟,还有好人、善良的人!世界这么大,海阔天空,你为何不去选择另一条出路!但从此,这世间再也没有了你的身影!

你为了什么而活? ——鲍海飞《趁着年轻去漂泊》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8905-953015.html)

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突然,人工智能就突飞猛进,砍瓜切菜般地杀到围棋最前沿了。李世石出生于1983年,身体状态和棋艺正处于巅峰状态,正像当年的卡斯帕罗夫。AlphaGo和李世石的比赛,应该会有很多人关注的。我看好李世石,这次比赛的结果应该是没有悬念的。但是,既然有了AlphaGo,那么人工智能战胜围棋最强选手的日子,也就指日可待了。也许不会像国际象棋那么快,但也就是五年或者十年吧,围棋这个人类智力的骄傲,可能也就要沦陷了。

——姬扬《有感于DeepMind击败围棋职业选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319915-953005.html)

平心而论,创办公立高等学校或许是解决高学历人才就业难的一个不错的方法,就如开办乡村医院或许是解决医学院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途径。一个新创办的学校能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让一大批除了做学术写文章之外没有其他太多谋生技能的高学历人才找到一个让人企羡的饭碗。当然,新学校创办之初以及大肆扩张之时,招进来的人必然会质量良莠不齐,庸人居高位的现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石宁《青椒之“专业负责人的烦恼”(1)》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98457-952903.html)

(栏目主持:罗萨)

强国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最初设置职业资格制度是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劳动者素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化评价人才的具体办法。经过20余年的发展,现在职业资格制度面临过多、过乱的问题。

可以说,清理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是职业资格制度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的必然方向,也是国务院简政放权、为大众释放更大创业空间和更多改革红利的必然要求。

更多发挥行业协会、学会的作用

“此次清理工作减少了44%的职业资格认证及评价,但能否称得上‘大刀阔斧’的改革还值得商榷。”在程杰看来,政府一系列的资格登记制度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说,其价值并不是太大。

很大一部分职业资格证书的设立与之前人社部门的职业资格认证管理制度有关,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现,有些职业资格认证越来越跟不上行业发展的步伐,通过行政管理的调控和手段更多的是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干预。

“有些行业和职业的出現是市场自发的过程,没有必要必须通过一个具有‘行业门槛’意义的职业资格证书来赋予个人从事某项行业的权

声音

北京雾霾根源于风力衰减

■晨晟

第二因素,“防风固沙林带”起到阻风作用。我们知,内蒙古高原地面坦荡,起伏和缓,没有高山峻岭阻挡来自北方的冷空气,造成冷空气活动既频繁又强劲,西北风速之大,犹如万枚离弦之箭。不过,风在自北向南吹时逐渐衰减,比如海拉尔一带的最大风速为27~30米/秒,到了北京就变为15~17米/秒;华北地区的大风日数,也是由北往南逐步递减,比如多伦的年平均大风日数在50天以上,到了天津则变成22~30天。但总体来说,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内蒙古高原在蒙古北线与内蒙古南线之间,不是充当“挡风墙”角色,而是一直起着“通风走廊”作用,形成中国北方巨大风口、风洞。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自然规律被人为、善意地改变了。经人类半个世纪改天换地,内蒙古高原的生态植被条件发生巨变。不仅如此,整个“三北防护林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也不断取得进展。北京以北及其西部的“通风走廊”,均出现了堵塞。

让我们先来看看50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生态植被的变迁情况吧:1955年时,内蒙古自治区的森林覆盖率仅为9.2%,草原植被覆盖度仅为11.8%;2005年时,内蒙古自治区的森林覆盖率上升到17%,草原植被覆盖度上升到35%;2015年时,内蒙古自治区的森林覆盖率又上升到21.5%,草原植被覆盖度进一步上升到44.1%。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使发黄的内蒙古逐渐变为绿洲,内蒙古呈现出森林面积、蓄积量持续双增长和荒漠化土地、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的态势。一条巨型防线——大型防风固沙林带,有效阻挡住了肆虐风沙的脚步。但这却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北京风的“阻挡和摩擦作用”首先在这里实现了,以致严重影响了北京和整个华北平原的自然风。北风不再“那个吹”,雪花也不再“那个飘”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50多年来北京地区沙尘暴、扬尘、浮尘、大风等天气的变化情况:沙尘暴(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同时风速达到或超过8米/秒),1951年至2005年时,年平均次数为0.5次,到2006年至2015年时,已降为0次!扬尘(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同时风速达到或超过8米/秒),1951年至2005年时,年平均次数为8.7次,到2006年至2015年时,已降为2.6次!浮尘(水平能

见度小于1公里),1951年至2005年时,年平均次数为4.0次,到2006年至2015年时,减为3.5次!大风(瞬时风速达到或超过17米/秒),1951年至2005年时,年平均次数为13.5次,到2006年至2015年时,已降为6.9次,减少了一半!正是由于蒙古高压转弱和内蒙古防风带有效阻风两大因素的作用,或许还应叠加上内蒙古“风力发电方阵”(目前已达1848.86万千瓦装机容量,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宏大)等因素的微小变风影响,使得华北平原的北风包括西北风,已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

面对风云变幻的反思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造成北京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地区的冬季北风明显减少变弱和污染物排放严重增大聚集这两大因素。而根本原因,则是北方风力衰减、风势过弱。随着政府对大气污染源大综合治理,北京地区雾霾污染程度有望得到缓解。但由于自然风不能由政府立马切换,所以北京雾霾严重问题,一时无法得到根治。我们对于根治北京雾霾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必须有充分认识。

现在来看,在人类痛心思考厄尔尼诺现象的同时,我们对内蒙古高原的风沙治理问题,包括哪块可以治理,哪块不能治理的问题,也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如果内蒙古绿化步伐按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即按照目前年均治理沙化土地1200万亩、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年均减少140万亩和37.6万亩的速度线性发展,那么要不了多少年,内蒙古的“通风走廊”将变成更厚的“挡风长城”,风能将京畿以北和以西消耗殆尽。届时,北京乃至广袤华北平原上空的重重雾霾,便难有消散之一天。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不是把树栽错了地方呢?“通风走廊”真的是“不通”也可以吗?也许,荒漠与绿洲的比例,在地球上是有不可更改的铁律的。

毫无疑问,雾霾,就是自然界对人类、对我们的“工业胜利”以及“绿化胜利”的又一次惩罚! (作者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特邀研究员)

三思堂

年味儿真的淡了吗

每到过年,人们常会发出“年味淡了”“越来越没有年味”的感叹。

有些年俗的演变是因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引起的自然变化,如祭祀习俗。现在城镇居民家中甚至部分农村都用上了煤气、天然气,柴灶逐渐消失了,祭祀也就逐渐消失了。

有的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如燃放鞭炮。鞭炮在春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在形式可以增添热闹气氛,内在心理方面则表达了民众在辞旧交替之际驱邪除祟、祈福求吉祥的愿望。对鞭炮“一禁了之”则弱化了春节的氛围。

之所以产生“年味淡了”的感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民俗的误解。民俗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是伴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进步、观念改变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民俗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年俗也是如此。试想宋代的过年和唐代的过年会一样吗,清代过年会跟明代过年一样吗?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两千多年,已沉淀在每位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今天春节所具有的巩固亲情、联络感情的功能仍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相信“年俗”的更新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政策当有人情味

老人和子女都租住公租房,却不在一个小区,这种情况今后将可得到照顾。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北京将出台正式的相关办法,明确老年家庭专项配租制度,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与子女同步选房。

老人与子女同步选房,可以实现就近居住,这项政策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儿,值得期待。住房从来不是单纯的居住问题,而与就业、教育、文化等其他社会资源配置密切相关。让老人与子女就近居住,则必须统筹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在规划、配置公租房时,应该同步解决这些问题,做到各项社会资源的均衡配置。

还有,在公租房收入准入线核定,以及配租、换房等程序性问题上,如何确保公开、公平,也有待相关部门制定明晰、可操作、可查询的办法。比如,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灵活选择房源?什么样的情况可配租更大面积的住房?诸如此类具体问题,都是对政策的考验。

当然,除了政府部门的努力之外,不妨引入市场力量作为调节和补充,从而真正实现政策惠民的初衷。

手段,不能以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认证就是弱化了行业准入制度。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管理。这种加强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保证资格水平不降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资格认定,转向进一步加强职业资格认证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第二是逐步加强行业协会、学会及各类社会组织开展相应的水平评价制度。”张一名建议道。

人社部副部长汤涛称,未来将实行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定期更新、动态管理,目录清单之外不得开展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同时将研究构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建设相适应的职业资格框架体系,完善职业标准和评价规范,逐步形成科学设置、规范运行、依法监管的职业资格管理制度。

汤涛表示,与此同时还将建立职业资格清理常态化机制和职业资格设置的实时监管,畅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持续查处挂证行为,严格落实考培分离,斩断利益链条。严厉打击助考犯罪活动,净化职业资格管理外部环境。

“职业资格评价是人才评价的重要方式,下一步我们还是应该逐步完善多元的、能力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要建立由政府、行业协会、学会等共同推动的立体的人才评价体系,为人才成长、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张一名说。

如何看待经济增长率创新低

■史宇鹏

论道

2016年1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15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按照可比价格,201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9%。这一速度既低于7%的心理关口,而且又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一时间,有些学者忧心忡忡,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大麻烦,还有些人开始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悲观失望。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一数据,我们是否需要对此担扰呢?

笔者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对中国经济悲观失望则大可不必,原因有两点: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在2015年整体表现不好,经济复苏缓慢,增长的基础仍不牢固。2015年6月,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的预期是增长2.8%,但2016年1月,世界银行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只增长了2.4%,下调了0.4个百分点之多。此外,对于美国、日本、英国等经济大国而言,世界银行均下调了对它们增长率的估计。在全球经济依然低迷的情况下,我国能够取得6.9%的增长率,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相比较经济增长速度而言,经济增长的质量其实对于长远发展来说更为重要,而数据显示我们增长的质量正在改善。质量改善的表现之一,是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优化。五年以前即201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是9.6:46.2:44.2,二次产业居于中心地位;而2015年,三次产业之比已经变为9.0:40.5:50.5,第三产业则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它的增长速度还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这表明,经济结构优化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而且还在持续改善之中。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表现之二,是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提升。2010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6.3%,而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达到了66.4%。这表明,在GDP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在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不断增强。质量改善表现之三,是供给结构在不断优化。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6%,仅比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增长速度高0.9个百分点。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则增长了10.2%,比整体速度高了4.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中,高技术产业的地位不断上升,供给结构正在改善。

可见,从宏观数据上看,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增长质量正在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显著增强。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对于去年6.9%的增长率无需过度担心和解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前景乐观,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要关注增长速度了。事实上,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对于我国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人均收入的角度而言,我国仍然处于世界较低的水平,发展的任务仍然较为繁重。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也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此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民生问题的改善也需要以一定的速度作为基础。

可见,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个现象,我们要战略上藐视它,但是战术上要重视它。为了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保持不失速,质量不降低,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做好以下两点工作:

首先,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说,靠资源投入所带来的增长本身并不是增长,只是规模的扩大;而通过创新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货真价实的、可持续的增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无论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还是经济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都要求我们加快推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为创新提供制度条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其次,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做好经济增长换挡期的兜底工作。

按照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古人说的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会倒逼创新的出现,那些勇于创新、敢于创新的企业反而有可能脱颖而出,从而带领整个经济迈向更高的水平。当然,这个过程对于特定的微观主体而言不一定是好事。那些创新能力较弱或者不愿意创新的企业会在竞争中受挫,甚至破产。这种淘汰功能正是市场竞争的应有之义,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体现,从长远来看有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但在短期内可能会造成部分企业的破产和人员的失业,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隐患。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反过来影响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从长远着眼保持政策定力不放松,另一方面也要健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做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的“兜底人”,保证增长速度的平稳换挡。(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